

文章编号:2095-0365(2013)01-0063-04

论近代国人对进化论的另类认知

苏全有, 李伊波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近代以来,进化论在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其间也并非如此单一,国人的另类认知亦广为存在。表现有二:一是对进化论的误解:个人哲学见解与进化论的混同、发挥;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一;生物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移植。二是互助论和退化论的盛行。

关键词:进化论;互助论;退化论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随着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深入传播,国人对于进化论的认识并不仅仅是单向性的认同,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对其质疑的声音,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互助论和退化论亦不绝于耳,不时见诸报端。目前学界对进化论的研究成果可谓相当丰赡,但此种对进化论另类认知的研究却较乏见,故以之为视点,对其进行探讨。

一、对进化论的误解

众所周知,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在“达”和“雅”方面可谓臻于完美,但并没有完全达到“信”的境界,他在翻译时并非纯粹直译,而是掺杂了诸多自己的哲学见解和政治观点,以符合当日中国政治、社会的现实需要及国人的情感认同。因而进化论在译介入中国之初,其理论架构既非无懈可击,且往往容易导致国人各种“见仁见智”的看法和观点,而各种看法之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同时对进化论的误读亦屡有所见,如个人哲学见解与进化论的混同、发挥,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一,生物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移植等,而时人对之的探讨、释疑遂常见诸报端。

(一)个人哲学见解与进化论的混同、发挥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路高歌猛

进,它在传播过程中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人的批评和质疑,1905年上海《大陆》杂志之载文《释进化论之误解》即有“近日世人批评进化之伦者,日多于一日”^{[1]3}之言。而对其产生批评的一大原因即为当下国人对进化论的认知产生误解,将个人的哲学见解与进化论混同,并加以发挥,遂与进化论的本质大相径庭,即世间“诸种谬论中首当留意者,为世间混同真正进化论与个人的哲学见解,而发挥为进化论者之充满于世也。”^{[1]4}“世人闻此等进化论道听途说,不求甚解,惟各奋智力以组织各种宇宙观与人生观,展转歧异,大与进化论相离,早已脱出进化论之范围以外,故以是为进化论本质则相去何止天渊。”^{[1]5}并认为:“若夫混真正进化论与粉饰进化论之某种宇宙观、人生观而一之以者,为进化论之本质,实不免于误解也。世间欲知进化论者,明此区别不至混同,斯为要已。”^{[1]8}此外,同年天津《教育杂志》载文《进化论误解之辩证》亦有相近看法。^{[2]37}其认为世人对此认知产生误解的原因在于“实由于未能十分了解进化论之性质”,“而若能了解进化论则无陷于如此之误者也”,“各人心中所造之人生观也,则因各人之性质及智慧之程度,过去之阅历,现在之境遇,又或依天气之晴雨,及胃肠食物之消化与不消化等”,遂造成“立说万端互相悬殊,而其距于进化论则一也”^{[1]4-5}的后果。

收稿日期:2012-10-29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对于这种误解不进行纠正将导致更深的谬误,即“根本上既误之,评论若不加以纠正,则彼不知进化论为何物之人,读此等批评不无误解,又或不免以非进化论而视为进化论,则谬甚矣。”^{[1]4}

将进化论同个人的哲学见解相混同并加以发挥,这本是近代国人对进化论的不同认识而已,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至于进化论难有也不可能只有唯一的见解。但时人对此种混有个人哲学见解观点的进化论进行批判,不失为对进化论传播的一种反思。

(二)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一

近代世人对进化论学说产生的另一误解即为:世人对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一。而此种误解在社会上是普遍存在的,正如1923年11月柯脱博士在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讲会上讲道:“今日吾人虽有一种普通误解,对于现今显明的一种进化学识,但对于此种观念固无人能明瞭者也,如达尔文之名在进化论中占重要地位,而吾人遂化学说与达氏学说如同一辙。”^[3]

1924年7月《申报》载文《中国科学社年会纪》亦道出了社会上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混一的情状,并将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天择与进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其言道:“今时一言及于达尔文主义,便有人联想及于进化论,以为进化论者即达尔文主义也,达尔文主义者即进化论也,此则误矣。进化论非达尔文主义也,达尔文主义特进化论之一种学说耳。天择亦不过进化之一种方法耳,此不仅常人误会之,报章杂志亦有依以误传者。吾侪于此当认识清楚达尔文主义仅为进化学说之一种,进化之原因亦非仅天择一种而已,但天择不失为进化之一重要原因。”^[4]

此外,1905年《大陆》杂志所载文章《释进化论之误解》也有类似看法,其言:“世间不知区别生物进化论与达尔文之自然淘汰说者甚多,是皆误解也”,指出“达尔文之自然淘汰说与生物进化论显相区别,故今后达尔文之自然淘汰说虽有认为全误之时,然真正进化论则毫不受其影响也”,“若不辨明此等相差之点而以生物进化之事实,混同于因欲说明其事所生之自然淘汰说,可谓误甚。”并阐释其原因:“夫自然淘汰之因达尔文而明者果何故哉?盖关于生物界之智识尚未普及也。”^{[1]6}

更有甚者认为“进化论不是达尔文所首创的,至于达氏的物种源流论(Origino of species)不过搜

罗无数材料把进化论有系统地宣传出来罢了,而所谓达尔文主义者,乃用以说明进化方法的一种学说。”^[5]

时人对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一进行揭露、释疑,无疑是对进化论认识的加深。

(三)生物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移植

自清末严复将赫胥黎的《天演论》译介入中国以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气息,以“竞存”观念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广泛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与践履。正如高一涵所言:“十九世纪下半段总算是进化论大出风头的时代”,“那时候有许多进化论家如赫胥黎、斯宾塞诸人都把‘生存竞争’当做人类求生的要素和天演进化的动机,凡同种同类,这个动物和那个动物,这个人 and 那个人的生存方法都是单靠着竞争一件事,他们的信条就是‘物竞’,‘天择’,他们的目的就是‘适者生存’,把生存竞争看做天演界中‘自然法则’。”^{[6]1}

然而随着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舆论界渐而产生了对其“反动”的声音,1929年黄凌霜著文《社会进化论与社会轮化论——其理论及批判》对社会进化论进行了阐释和批判,他认为:“近代‘社会进化主义’(Social Evolutionism)严格地说来始自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指出了进化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存在和影响,即“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社会思想之最大标志是一种社会及历史的变迁之纵线的进化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无数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道德学家都要异口同声地形成‘历史进化的法则’找寻‘历史的趋势与倾向’,这种情状一方固然由斯宾塞的进化论所引起,一方也可以说是孔德(Comte)的三阶段的法则之纵线进化概念所造成。”^{[7]2}随之,黄氏笔锋一转对社会进化论进行了批判,要言之即:“社会进化论者对于社会组织及文化的进化之观察是错误的”,“社会进化论者以严格的生物学法则应用到历史的进化是错误的。”^{[7]9,11}一言以蔽之,生物领域的进化法则是不能移植于社会科学领域,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生搬硬套是不恰当的。

由上可知,近代国人对进化论另类认知的一大表征即为对进化论的误解,时人通过著文对进化论的误解进行辨证,对国人更好地认识进化论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对进化论的了解不断加深。

二、互助论和退化论的盛行

进化论的迅速传播和巨大影响使其成为影响近代中国的主要思潮,但在其风行的同时,由于新世纪派和天义派知识分子对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大力追捧,以及国人对“一战”的反思,遂认识到竞争进化论是欧战爆发的重要的思想根源,企求通过对互助论的研讨,以期对社会有所裨益。因而出现了诸如互助论之类的对进化论的另类认知,而这种认知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并产生深刻影响。

(一)互助论的勃兴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的残酷进行,列强间的肆意火并,越来越多的国人对西方的价值观念由无限景仰转变到产生质疑、批判,进而对战争进行了反思,认为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竞争进化论导致了近代国际强权主张的肆虐、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兴起,成为大战爆发的重要思想根源。正如曹任远在《达尔文与近代社会思想》一文中说道:“自一八七一年达尔文人原论出版,以迄一九一四年欧战开始,四十余年之间,世界言政治者、言群理者,几全为达尔文之思想所支配。以为人群进化,亦不能逃生物竞争生存之公例,于是主张强权,进而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演成数十年来残酷恐慌之世界。”^{[8]6}因而世人渐对进化论进一步进行了思考、解读,而由克鲁泡特金首创的互助论大受国人追捧,《申报》载文《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即言道:“达尔文的学说,可以说建设了近代人类思想的基础,于文明的推进上不无功劳”,“只是,近来帝国主义者侵略雄心,也未始不是由于这种生存竞争的学说刺激起来的,因而近代的哲学者对达尔文大表不满,又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出来,给达尔文的进化论以一个强烈的打击。”^[9]曾经烜赫一时的竞争进化论顿显冷落,互助论遂成为此期对竞争进化论进行“反动”的重要“堡垒”。

1918年10月18日,蔡元培在北大“国际研究”演讲会上作了《大战与哲学》的讲说,其言道:“互助主义,是进化论的一条公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两条假定义。但他所列的证据,是竞存一方面较多。继达氏的学者,遂多说互竞的必要。”^{[10]53}蔡氏认为互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达尔文更侧重于竞存方面而

已。然而蔡元培还是更青睐互助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进化需倚靠互助来实现,在演讲中他最后劝诫道:“至于互助的条件,如孟子说的‘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不通功易事,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普通人常说的‘家不和,被邻欺’,‘群策群力’,‘众擎易举’,都是很对的。此后就望大家照这主义进行,自不愁不进化了。”^{[10]55}

此外,高一涵也有类似观点,即“克氏反对的进化论不是达尔文广义的进化论,是达尔文以后狭义的进化论,所以克氏说达尔文自己有时为特别的也会把这个名词(竞存)作狭义的解释,但对后辈也曾警戒他们不要把这个名词用得太过狭”,“可见得达尔文进化论中本包涵竞存和互助两个意义,不过他指出的证据偏重在竞存一方面,后人把他互助一方面的意思丢掉了,单拿互竞来做进化的条件,所以竟造成一个惨刻无情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互助和互争都是自然的法则,但是互助是进化的一个要素,比互争更加重要”,“互助是进化的要素,人类是由互助进化不是由互争进化。”^{[6]6,10}简言之,互助和竞存同为进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片面强调竞存而忽视互助导致了社会的“无情”,世界的“弱肉强食”,在人类进化的进程中互助起更大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结束后进化论和互助论竟被归咎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关系恶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如1948年《北方杂志》载文言及:“今天国际局势所以恶化,并不是因为人类喜欢战争、制造战争,而是在两个不同的基本意识上的矛盾,这两个基本意识,就是自由民主阵营所代表的‘互助论’和共产集权阵营所代表的‘进化论’。”^{[11]27}

互助论在中国的勃然而兴和迅速传播的主要凭藉即为,“一战”的爆发,战争的残酷及其对欧洲的巨大破坏,使国人对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反思和重新认识的结果。互助论的盛行是对清末在中国影响极深的竞存进化论思想的“反动”,是国人对进化论的一种另类认知。

(二)退化论的泛起

当进化论在社会领域内高歌猛进,快速传播之时,反其道而行之的退化论的呼声亦不绝于耳,不时见诸报端。1926年《黎明》刊登了一篇对社会上存在的退化论思想进行揭露的文论——《退化论与新十字军》。其言道:“当然,我们不应将达尔文当作菩萨般的顶礼膜拜,然而解剖学上、古生物学上、

人类学上、胚胎学上的种种证据和发见,至少可以说进化论的基础是已稳固的了。但是在二十世纪今日,在进化论唱了得胜歌的时候,居然有‘退化’的提唱,这不可以不说是一件奇异而可痛的事。”随之,作者又提到他耳闻的主张退化论,反对进化论的事件,“在上星期的《大陆报》上,又看到了一段新闻,说是台省有个富翁,情愿倾家捐资为反对进化论的宣传。一方面各教育在正联络,组织大规模的运动,号为‘新十字军’The New Crusaders,非达到‘扫除妖言’,‘荡尽邪说’的目的不止云。”^{[12]89,90}

随即该文作者对之进行批判:“在一班善男信女预备竖起的新十字军旗帜的下面,我们可以看一大批时代落伍的人们,不,是‘开倒车’的人们。时代落伍者还不过向着世界潮流和蜗牛一般的动着,那些‘开倒车’的人们却拼命地背道而驰——不止他们自己,还拉拢不少的‘同志’跟他们一起向后转,开步走呢!最后非至退化到原生动物的阿米巴不止!也许那些新十字军人还不甘为阿米巴,还要

退化到比阿米巴更下贱的神秘状态——上帝!上帝!!上帝!!!”并发出叹息:“也许达尔文(罪过,罪过!埋没了一辈进化论的先驱!)数十年提唱进化论是确实失败了。不然为什么人类经过数万年的进化,在今日二十世纪,尚且有比低能儿或白痴脑子更劣等的怪东西——提唱退化论的怪东西!假使真有进化(理智告诉我是真有的),进化是白白了!”^{[12]90} 其从侧面道出主张退化论、反对进化论的思想在社会上的大肆存在及其产生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知,近代中国社会对进化论的另类认知,是与进化论的传播共存的,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单一性的认同,它也经历了被误解和质疑的历程,其中也不乏诸如互助论、退化论等对其“反动”的声音。这些对进化论的另类认知是国人对进化论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在研究进化论之时不应该忽视社会上对进化论的另类认知,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认识进化论。

参考文献:

- [1][作者不详]. 学术:丙科:释进化论之误解[J]. 大陆, 1905,3(6).
 [2]浅秋次郎. 进化论误解之辩证[J]. 教育杂志,1905(9).
 [3]柯脱博士演“进化之意义”[N]. 申报,1923-11-11:18.
 [4]中国科学社年会纪[N]. 申报,1924-07-07:10.
 [5]张天德.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科学)[N]. 申报, 1925-08-12:17.
 [6]高一涵. “互助论”的大意[J]. 新中国,1919,1(5).
 [7]黄凌霜. 社会进化论与社会轮化论——其理论及批判

- [J]. 社会学刊,1929,1(1).
 [8]曹任远. 达尔文与近代社会思想[J]. 新群,1920,1(3).
 [9]果轩. 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N]. 申报,1936-07-16:19.
 [10]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917-1920)[M].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11]青松. “互助论”与“进化论”[J]. 北方杂志,1948,3 (1).
 [12]低能儿. 退化论与新十字军[J]. 黎明,1926(32).

On the Alternative Cognitive of the Modern Chinese Toward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SU Quan-you, LI Yi-bo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has been more widely recognized during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in China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but there are some types of alternative cognitive as well which can be mainly classified as two kinds: first, there a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to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such as personal philosophical insights and evolutionism confused and deducted further;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Darwinism mixed up; transplantation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in the social field. Second, prevalence of mutualism and degradation.

Key words: theory of evolution; mutualism; degeneration

(责任编辑 王丽娟)